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高校主题出版
GAOXIAO ZHUTI CHUBAN

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The Series on Minority Literatures: Perspectives from A Pluralistic and United Chinese Nation

丛书主编: 姚新勇 副主编: 邱 婧



Inside and Outside
of Liangshan

Yi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a

邱 婧 著

凉山内外

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高校主题出版
GAOXIAO ZHUTI CHUBAN

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The Series on Minority Literature: Perspectives from A Pluralistic and United Chinese Nation

丛书主编：姚新勇 副主编：邱 婧

凉山内外： 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

Inside and Outside of Liangshan
Yi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a

邱 婧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凉山内外: 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邱婧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 11

(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68 - 2218 - 5

I. ①凉… II. ①邱… III. ①彝族—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3084 号

凉山内外: 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

LIANGSHAN NEIWAI: ZHUANXINGQI YIZU HANYU SHIGE LUN

著 者: 邱 婧

.....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武艳飞

责任编辑: 黄少君

责任校对: 彭 睿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83 千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 3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序

本套丛书中刘大先先生的著作题名为“千灯互照”，本是形容中华多民族文学丰富多彩、交相辉映之态，现借以形容这套总数不过十本的丛书，自然太过夸张，但若以点出本套丛书之于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多样性、丰富性，虽仍夸张，却并非漫无边际。至少我们的确可以罗列出本丛书相关的三五特点。第一，以主题、研究专题、研究领域为集结的文学研究丛书自然很多，但征诸不同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者，将其成果集结起来，组成一套研究品质较为纯粹的丛书，且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这样的情况恐怕还不多见。第二，本丛书的作者为中青年学者，有的已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多年，成果丰硕；有的虽然才博士毕业几年，但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更有几位已跻身于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前列。本丛书收录的十本著作中，或是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或是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这都保证了丛书的新锐性、前沿性、专业性与可靠性。第三，丛书的主题、领域、视角多样丰富，所涉族裔文学现象多样，时代纬度参差交错。有神话与史诗研究，民间口头文学及说唱文学研究，族裔文学个案剖析与多民族文学现象的互动分析，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及少数民族文艺创作、表演现象的宏观扫描及理论概括，某一族裔文学、文化经典传统个案的诗学理论之内在结构、文本肌质、表演仪式、叙述模式的深度剖析与细致型构，某一族裔当代文学创作的文化转型、民族心理与时代张力的考察，族裔母语文学的考察或母语、汉语双语互动的分析，等等。第四，丛书名为“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这并非政治正确的口号，而是本套丛书研究特点的自然呈现，更是丛书作者之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态势的敏锐观察与理论回应。而具体落实于本丛书上，则呈现为一个重要的共性——互文性。第五，互文性。中国多民族文学、文化的互文性，某一具体族裔文学、文化现象中的互文性，

也为本丛书多数著作的特点之一。这既是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更是中国多民族历史、文化、文学互动的自然结晶。比如神话研究，自新时期以来重新恢复生机，国外各种神话学理论渐次被介绍到中国，积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神话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神话所表征的民族或族群关系之“分”的趋势却日益明显，研究者、研究对象、接受群体的民族身份的“同一性”也似乎愈益强化。而《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的作者王宪昭先生，在多年材料与研究积累的深厚基础上，有力地考辨了我国多民族神话“同源母题的作品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这一现象，不仅进行了数量可观的神话文本的互文性解读，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增添了丰富多彩而又切实有力的论证。再如《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研究》一书，从书名上看，此书似乎只涉某一具体族裔的母语诗歌创作，但实际上，锡伯族的形成，它从祖国的大东北迁徙到大西北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宏伟史诗。因此在锡伯族的诗歌中，故土的大兴安岭、白山黑水，新家园的乌孙山脉、伊犁河畔，交相辉映；“大西迁”的刻骨铭心与“喀什噶尔”的深情咏叹，互为参照；族裔情感与国家情怀，水乳交融。满、汉、蒙、哈、维等语言因素都不同程度地结构或渗透于锡伯语中，因此，本书相当关注锡伯族母语诗歌创作与汉语之间的关系，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东巴叙事传统研究》一书，以更为纯正的理论品质，更为肌理性的文化、文本研读，从多角度、多层面探究了东巴叙事传统的成因、传承、流布、特征，并通过深描东巴叙事文本在祭祀仪式中的演述，揭示了口头文本、书面文本、仪式文本、表演文本在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空间中的互文互构关系。作者还把东巴叙事传统与彝族、壮族、国外的史诗作了横向的比较研究，对当下的民间叙事学、史诗概念及类型作了深入的反思，表现出与国内、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对话的努力。

说到研究之间的互文性，对有心的读者来说，其实从本丛书的不同著作中也不难发现。比如说，丛书中有的研究主题相对比较封闭、形式化，所说、所论也容易被归为某一民族的特点，这尤其表现在那些神话或史诗研究中。而另一些有关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究，则相对更注意“民族”“民族文化”“民族文学”“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的相对性、建构性。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对照性阅读，或可互为弥补、相互启发。

比如《彝族史诗的诗学研究——以〈梅葛〉〈查姆〉为中心》和《凉山内外：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所论文学现象皆属彝族，而前者着重于通过

细读《梅葛》《查姆》揭示彝族史诗的诗学特征，后者则更敏感于新中国民族识别、少数民族文学工程的实施，之于整体性的彝族诗歌、彝族意识的生成、流变与转型的促动。这样，后者之于前者可能就对“彝族”“彝族文学”的天然性、自在性多了质疑性价值，而前者则又可能提醒后者，彝族、彝族意识、彝族认同的建构，并非权力、他者的随心所欲。这样的互文性阅读，有可能突破本丛书有限的数量，更为宽广、丰富、深入地去理解、把握中国文学、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之复杂性。

当然，不管本丛书的认识价值与问题视野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其视域肯定是有限的，况且收录其中的著作质量并非齐一，也自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个中缺憾不知有无机会弥补。

感谢王佑夫、关纪新两位先生对本丛书的大力推荐，感谢丛书作者惠供大作，也感谢暨南大学出版社徐义雄社长的鼎力支持。

姚新勇

2017年7月

于广州暨南园

序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七年过去了。七年前，邱婧刚刚考入暨南大学随我攻读博士时，或许阅读过几篇少数民族文学，或许对某几个少数民族作家有所耳闻，但她肯定谈不上了解少数民族文学，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会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如果说那时邱婧哪方面研究基础较好的话，应该是诗歌吧，而且应该是那种偏向于审美性的诗歌研究基础吧。然而，她却跟随我这个老师开始涉入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而且这一研究对象，还有可能伴随她今后的整个学术生涯。

“老师”是一种责任的表征，也可能是一种亲近的师生关系的符号，但是它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命令，乃至一种难以商量的“学术霸道”，我这个老师就是如此，尽管自认为属于随性、热爱自由的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师从恩师许志英先生读博，先生建议我研究《阿Q正传》的接受史，从先生的话语中，我体味出了几分寄托未竟事业的郑重，可是我仍然对先生说想做当代文学的选题，比如说“知青文学”。先生——在我的眼中那样严肃甚至威严的许志英先生，没有多说什么，同意了我的研究意向。可是十几年后，当我自己带博士时，却给所有想随我学习的博士生申明，他们的博士选题，必须是少数民族文学，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相当不讲理，蛮横，是吧？不过，这种不讲理的深层，却与当年许先生的建议有着内在的接近。

我本人大约是从新千年起转向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开始，这一转向的专业性就不很纯粹，更确切地说，就不是那么文学，那么审美。促进这种转向的直接原因，是对家乡——新疆——的某种模糊不明的不祥感。所以，我既想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帮助曾经被严重忽视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在中国的空间中被更多的人了解，同时，更想通过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去了解、倾听少数民族的声音，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并为中国、

中国民族关系的未来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所以，希望自己的博士生能够帮助我推进这一抱负，承担类似的责任，能够接着我已经展开的研究去做，去深化，或拓展新的研究方向。

不记得邱婧对我要求她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有过什么不情愿或犹豫，以她的聪慧自然明白，既然不情愿也得接受，那就高高兴兴地接受吧。

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并非只是从相对比较熟悉的文学领域，进入另一个陌生的文学领域，还意味着知识结构的重新搭建，方法论的补充与再训练。其“补课”的进度快还是慢，虽然与导师的引导有关，但主要是看学生自己的努力与天资。记得我曾建议邱婧去读一本厚厚的英文著作——《杂糅的诗学》，当时多少有些担心，如此之厚的一本书，是不是会用掉她两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她很快就读完了，并且写了一篇评介文章交给我。读罢，感觉她把握住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但是缺乏与中国问题的关联，于是给了她一些修改意见。但她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润色就投了出去。不久，一家核心期刊来了录用通知，邱婧有些兴奋地告诉了我。如今攻读博士，如果没有完成学校的要求，发表规定数量的核心期刊，就意味着得不到博士学位，而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带博士生最头痛的事项。然而，我并没有怎样表扬她，还是说文章缺乏与中国现实的联系，只是介绍了该书所研究的现代英语诗歌的后殖民杂糅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族群、文化多样的国家来说，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来说，这种“杂糅诗学”的研究方法，可能会有怎样的启发性，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又有怎样具体的杂糅性表现，这些问题她几无涉及。作为理论学习心得，为顺利毕业、获得学位，这样的文章还可以，但博士论文肯定不能这样写。不过，说归说，其实我知道，如果邱婧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的话，恐怕那篇文章未必能够发表，这是今天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很可能经常会遭遇到的悖论吧。

建议邱婧研究“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与我以前的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直接关联，我希望邱婧一方面能够接续我的研究，考察90年代后期以来彝族汉语诗歌写作的变化与发展，更希望她能够跨过我的研究，返回去考察“十七年”时期的彝族汉语诗歌，去了解作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构成部分的当代彝族诗歌，是被怎样建构起来的。只有补充了这部分内容，才能够谈得上对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的较为全面的研究。不仅如此，彝族这一当代建构性较强的民族，还有着其他少数民族所不大具有的同族群跨文化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学界对当代彝族诗歌的原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凉山彝族的诗，而较少关注云南、贵州彝区的诗歌，更缺乏对它们之间的比较性研究。我希望邱婧能够通过她的博士论文，将上述几大方面联系在一起，

做出综合而深入的研究。

这种设想听起来漂亮、宏大，但若想真正落实，又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尤其是在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内，我甚至有点担心这样的构想，是否会把邱婧那纤细的身体压垮。还是不记得她有过犹豫，好像还是记得她眯起那双灵巧的小眼边点头边说，好的好的。很快，两年多过去了，这本《凉山内外：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就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在这本书中，当代中国彝族汉语诗歌，第一次全面、系统、大跨度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它不是我们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那种现象性的扫描，也很少那些常见的似是而非的望文生义或观念硬套，虽然由于研究时间的限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有些解释还显得不足，有些方面涉及不足或还没有真正涉及，与我理想的目标尚有一定的距离，但它的确可以说是一本集灵气、资料、理论和跨学科视野于一体的较为成功的小书。更重要的是，对于邱婧来说，正是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她才真正初步具有了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所必备的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能力，真正较深刻地体悟到了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特有的难度、意义与快乐。

不过这些肯定性的评论，有一些是我今天对邱婧再认识的结果。自她入学跟我学习起，我就担心她会因聪明而浮躁，沉不下心来。所以虽然很少批评她，却也很少表扬她，尽管她的进步、成绩都是明显的。读博期间，她先后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奖学金，毕业后又获批一项省社科项目和两项国家级课题，并且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但我都没有给予她多少表扬，反而时常提醒她要注意，太过顺利可能会潜在危险，甚至当她考驾照一连三次失利而有些气馁时，我还半安慰、半开玩笑地说，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样样顺利。

半年前邱婧给我发来一篇“延边纪行”，读后，我突然意识到，邱婧所取得的进步是那样沉稳而扎实；她毕业后所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已经放在本书后记中）也显示出，她正在成长为一个有抱负的复合型的学术工作者。

姚新勇

2017年7月5日于广州暨南园

总 序 / 1

序 / 1

导 言 / 1

第一章 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谱系 / 3

第一节 建构的开端：1949—1980 年 / 5

第二节 延续与发轫：1980—1995 年 / 9

第三节 多声部共振：1995 年至今 / 11

第二章 审美和重构的历程：彝族诗歌分类考 / 16

第一节 作为民族寓言的抒情诗 / 17

第二节 原乡的复魅和招魂 / 30

第三节 写实的发生 / 40

第四节 暧昧的地域性 / 52

第三章 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的生产机制 / 69

第一节 期刊编选与诗歌生产 / 69

第二节 评奖机制与诗歌生产 / 82

第三节 网络、高校诗歌社团及其多元化延伸 / 88

第四章 民族本位性的观察 / 98

第一节 “谁”是民族知识分子 / 98

第二节 风景之诗，诗之风景 / 110

第三节 语言的困境 / 118

第四节 记忆与身份之再确认 / 123

结语：民族、想象与诗歌生产 / 128

参考文献 / 131

后 记 / 141

导 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如果进一步明晰研究对象，从时间跨度来看，本书研究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的彝族汉语诗歌。近三十余年，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①，无论是经济模式，还是文化生产，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文学的生产与这次转型息息相关。尽管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及进程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进程，然而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冲击。因此，本项针对彝族汉语诗歌的研究，可从一个侧面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少数民族话语的流变、集结和多声部共振。

从地域空间来看，彝族诗人的汉语诗歌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划分。本书所研究的诗人群体来自此次民族识别中被统一认定、命名为“彝族”的族群。彝族主要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广西，人口约776万。其中广西彝族人口约7000，四川彝族人口约178万（分布在凉山、峨边、马边等地），云南彝族人口约502.8万（分布在楚雄、红河、石林、禄劝等地），贵州彝族人口约84.28万（分布在毕节、六盘水等黔西地区）。本书所涉及的彝族写作，包括生长在云南、贵州、四川大小凉山、广西等地区的彝族诗人的写作。他们在地理空间和居所方面分布不一——甚至由此导致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差异^②，如凉山地区

① 本书所提到的“转型期”定义参考自姚新勇在《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提到的观点。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许多学者使用“新时期”来定义70年代末至今的文学，而笔者认为“转型期”的定义更为明晰地指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文学进程。

② 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在彝族同一族群内部，即可分为六大方言区、五大次方言区，口语尚且不同，行政区划也不尽相同，在历史上凉山地区彝族和云贵地区彝族与中原的互动关系亦不同，那么文化心理的差异在所难免。有关方言的数据引自易谋远：《彝族史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彝族诗歌写作与云南、贵州彝族诗歌写作之间的差异性。同一族群内部的共性或许被许多评论家注意过，但是他们之间的民俗文化以及创作的差异性却鲜有学者研究，本书的研究会有所涉及。

从语言范围来看，彝族诗人用汉语创作的诗歌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1949年以后涌现的彝族诗人，大多数用汉语写作诗歌（仅具备用汉语写作的能力），少部分从事彝汉双语诗歌创作或是纯粹的彝文创作。因此在当代彝族文学史的语境下，囿于笔者语言能力所限，本书仅研究彝族诗人书写的汉语诗歌。^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汉族文学书写中，宏大叙事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书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主线则由对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转向了对本民族的歌唱和书写。世纪之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被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洪流冲击得愈加严重之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也几乎在同时做出反应。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渐土崩瓦解，承载两重边缘化角色的少数民族的“原乡”也渐渐消逝，而诗歌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情感的文学形式，既活跃在转型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又给我们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观察提供了参照。

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原因有三：首先，转型期的彝族诗歌在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中极具代表性，通过这项考察，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趋向和特征；其次，对转型期彝族诗歌的考察，能够以一个地处西南边疆的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的角度透视出中国自80年代以来社会思想文化的大转型；最后，出现于21世纪的彝族汉语诗歌的多元化写作能够反映转型期中国彝族社会出现的诸种问题和现状。因此，这项研究是迫切而必要的。

为了全面进行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研究，本书将围绕以下五个主题展开：第一，对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发展阶段和总体创作情况的考察。第二，对不同内容和风格的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以及四川、贵州、云南几大彝区之间由于历史、地理原因造成的创作差异性的分类考察。第三，对彝族诗歌的多重生产机制和评奖机制的考察，本书将从公开出版的期刊、民间诗歌期刊、网络发表情况、高校诗歌社团等方面进行分析。第四，对彝族汉语诗歌中折射出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本位性趋向的剖析。第五，对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生产、运作和驱动力的概述。

^① 这并不影响学术的严谨性，因为单独使用母语创作却不会汉语创作的彝族诗人很少。原因在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彝族诗歌。这一部分诗人几乎都是在1949年以后接受过汉语教育的彝族人，他们更擅长汉语写作而非彝文写作。

第一章 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谱系

尽管本书是基于对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的考察而作的，然而为了更加明晰研究对象，我们有必要重新返回到历史现场，对1949年以后的当代彝族汉语诗歌^①的发展概况进行梳理和区分，展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历史流变和同时期的社会语境，由此建立的参照系能使得本书内容更加全面。

关于彝族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彝族当代文学及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第一阶段的时间划分，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②如李力在1994年版的《彝族文学史》中将彝族当代诗歌划分为两个阶段，其界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姚新勇亦在2010年版的著作《寻找：共同的宿命和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中几番提及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彝族诗歌的时间划分问题，他以1980年为界将少数民族文学和彝族诗歌都分为两个时间段，^③认为“同总体中国文学一样，彝族现代诗歌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转型，由传统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学，逐渐转向全新的彝族精神家园建构之咏唱”^④。当然，在诸多研究者关于彝族当代诗歌的历史分期观点之中，有些分期方法不够细致，

① 所谓“当代”，即等同于文学史学科划分规则中的“当代”——指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所谓“彝族汉语诗歌”，是指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身份识别过程中被认定为“彝族”的中国公民用汉语创作的诗歌。

② 柳爱江的《彝族青年诗人创作管窥》（发表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认为，1980—1990年是第二个阶段，1990年至今是第三个阶段，笔者对此持商榷意见，事实上新兴的诗歌编选组织和多元化的民族诉求是2000年左右才出现的。柳爱江将“60后”诗人作为一个分期，“70后”和“80后”诗人作为另外一个分期，笔者不认可此种观点，即使在社会学研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80后”也向来被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他们和“70后”的生命体验大相径庭。

③ 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和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④ 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和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有些过于注重肌理而不够立体、全面。

笔者认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可大致划为三大分期：第一分期为1949年到1980年（彝族当代诗歌的建构时期）；第二分期为1980年至1995年，这一时期的诗歌产生于建构时期宏大叙事的延续和民族意识萌芽的交互作用；第三分期为1995年至今，这一时期的彝族诗歌体现出强烈的集结性、杂糅性以及多声部共振的话语形态。

具体来看，当代彝族诗歌发展的第一阶段止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主流文学分期中的“十七年文学”加上“文革”时期的文学，这是彝族当代诗歌建构的时期。当时的少数民族诗歌都曾受到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话语和解放话语——的高度影响，彝族诗人的创作也几乎不例外地包含着此类印记。比起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彝族诗人们更注重表达的是“奴隶”和“奴隶主”^①之间的阶级话语^②，这与同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全世界无产阶级兄弟”的话语是相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彝族汉语诗歌进入第二个分期，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彝族诗人改变了之前受国家话语高度影响的“阶级诗歌”，开始将本族群的文化传统与新诗的体裁相结合，民族意识开始觉醒。1985年以后，四川凉山地区、云南、贵州的诸多彝族诗人创作了大量汉语诗歌，掀起了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热潮。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诗歌的审美水平和艺术水平比以往有所提高。21世纪以来，彝族诗歌的多元化写作渐渐形成，新一批的彝族诗人、作品、民间的彝族诗歌编选组织开始涌现，诗歌的发表机制也不断更新，不再仅限于单一的公开出版物刊出。21世纪的彝族诗歌写作有着多元化、多声部的发展趋势和不同表现形式的民族本位性诉求。

① 之所以将“奴隶”加引号，是因为彝族文化传统中的阶级分类与西方理论中的“奴隶社会”“奴隶”等术语有一些差异，尽管1949年以后诸多民族工作者强调凉山地区实行的是“奴隶”制度，但是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很多时候，“奴隶”属于半长工半仆人的角色。

② 吴琪拉达（汉名吴义兴）堪称彝族当代汉语诗歌的开创者，他在1950—1980年间创作了大量作品，如《孤儿的歌》，目前可见资料有西南民族大学刘光娘藏油印本。又如其创作的《奴隶解放之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第一节 建构的开端：1949—1980 年

文学史的界限向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虽然将 1949 年当作彝族当代诗歌的第一个分期的开端，然而彝族人用汉语创作现代诗歌的历史却早于这个时间节点。除去明清时期云贵地区彝族诗人的古体诗歌创作之外，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李乔、李纳、苏晓星、熊正国、普飞、戈隆阿弘（汉名施友万）、吴琪拉达、普梅夫、龙志毅、替仆支不（汉名韦革新）、阿鲁斯基（汉名卢兴全）、涅努巴西、张昆华等彝族诗人均开始了汉语诗歌的写作。^①

1949 年到 1980 年间，彝族诗歌作品总体来说并不算多，而且这些诗人分布和生活的地域几乎都在云南与贵州。^② 值得一提的是，日后彝族现代派诗歌大潮的兴起之地——大小凉山，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却很少。^③ 彝族诗人创作大潮的地域转换是十分值得思考的，而这个成因几乎成为本节论述的主体部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彝族文学的建构基础是彝族人的族群认同。这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民族识别密不可分。作为现代中国 56 个民族之一的彝族，其文学史建构是在民族身份确定的基础上发生的。下面将云南、贵州的彝族汉语文学和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汉语文学分开阐述，能够使这个事实更加明晰。

一、云贵诗人群的源起

诗人的语言使用能力从来都与其生存的土壤密不可分。云南、贵州诗人早在明代就扬名于汉语诗坛，高乃裕、高程、禄洪正是那一时期的彝族代表诗人，清代又出现了那文凤、鲁大宗、余家驹、余昭、安履贞、余珍、李云程、安健等用汉语创作的彝族诗人。诸多彝族诗人拥有精妙的汉语写作能力。

元明两朝的中央政府均在云南和贵州“边民”聚居地区设置土司制度。元朝灭亡后，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傅友德“征南将军，帅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将步骑三十万征云南……由永宁趋乌撒，而自帅大军由辰、沅趋贵州。克普定、普安，降诸苗蛮……得七星关以通毕节。又克

① 部分资料参考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仅有一个特例：彝族诗人韦革新出生于广西，广西的彝族人口不多，现有 7 000 人。

③ 彝族诗人吴琪拉达是贵州阿孟人，在凉山工作，其生平将在下文合适的部分提及。

可渡河，降东川、乌蒙、芒部诸蛮。乌撒诸蛮复叛，讨之……水西诸部皆降”^①。至此，朱元璋的中央政府得以控制云南、贵州的彝族社会，并设立土司和流官制度。诸如高乃裕、高程这样的土官家庭（姚州土同知），必须习汉文、读汉书，在此环境下积累了深厚的汉学功底，“祖孙三代皆诗人”^②。据此不难想象云南、贵州彝人作汉诗的悠久传统。

与此相比，四川凉山地区的汉语书写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当然，凉山地区内部各地域的汉化程度有所差异。俄国人顾彼得的《彝人首领》^③讲述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游历凉山西和北方向的汉源、甘洛、越西、西昌一带的经历，详尽地描述了自身对彝族各阶层的了解和印象，并提及在外求学的凉山彝族土司岭光电和曲木藏尧^④，这几处地方比起凉山的其他地区来说，与汉族接触相对较多。

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中所进行的民族学调查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他于1943年夏考察的地域是大凉山黄茅埂两边的雷波和美姑，当时这两地的彝族社会很少有汉人长期定居，基本保持着完整的传统家支体系和本族宗教文化，亦保持了本族语言文化，掌握汉语的彝人很少。总体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凉山地区才渐渐接受汉族文化的大幅影响，因此，彝族当代诗歌的第一个分期里鲜有生长于凉山的彝族诗人亦在情理之中。

1949年到1980年间，云贵诗人群体创作了不少汉语诗歌。从个人创作来看，有吴琪拉达的《孤儿的歌》和《奴隶解放之歌》，童嘉通的长诗《金色的岩鹰》^⑤，替仆支不的《我握着毛主席的手》《石磨歌》《奴隶的女儿》，阿鲁斯基的《为国争光》《滇池游记》，涅努巴西的《南诏国的宫灯》，普阳的《红河之歌》^⑥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对彝族古代典籍、长诗、经书的汉文翻译和编选结集数量很大，如《阿诗玛——彝族民间叙事诗》^⑦等。

① 《明史》列传第十七。

② 李力主编：《彝族文学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页。

③ 顾彼得著，和铸宇译：《彝人首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岭光电和曲木藏尧是表兄弟，因土司身份和特殊时间际遇而在外求学，前者拜20世纪30年代任川康边防司令的羊仁安（汉人）为义父，民国二十二年（1933）考入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以彝族青年身份面见过蒋介石；后者毕业于南京军政大学。

⑤ 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

⑥ 部分资料参考自芮增瑞：《彝族当代文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⑦ 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阿诗玛——彝族民间叙事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